

Tho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译学荆棘

傅敬民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译学荆棘

傅敬民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学荆棘/傅敬民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309-13029-4

I. 译… II. 傅… III. 翻译理论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6828 号

译学荆棘

傅敬民 著

责任编辑/朱莉芝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9.25 字数 238 千

201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029-4/H · 2730

定价: 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傅敬民，社会学方向博士，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上海翻译》执行主编。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上海市外文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期刊杂志研究会理事。英国皇家语言学家协会中国区委员。曾任上海商学院外语学院院长、国际交流学院院长、留学生部主任等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培训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高校教师进修培训中心讲座教授。翻译出版译著《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年轻的狮子》《亚当·比德》等十四部，编著、主编翻译教材《英汉翻译辨析》《实用商务英语翻译教程》等四部，出版学术专著《译学荆棘》《圣经汉译的文化资本解读》等三部；主持国家人文社科一般项目一项，主持完成其他各类科研项目十余项，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曾获得“上海市育才奖”等荣誉称号。

本书出版得到“上海市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
建设项目”资助，特此鸣谢！

形散神凝 译学跋涉

1991年初,敬民自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成分配到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与我同系教研。但见他风华正茂,勤思考,敏于行,心生乐意。时值《上海科技翻译》(现《上海翻译》)人手短缺,邀他参与。敬民不计报酬,与我共度了一段清苦的、字栉句比的编辑时光。光阴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期间,他的一篇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年会论文,经我压缩成豆腐干文章,刊登在《上海科技翻译》;处女作的面世给初出茅庐的学子以鼓舞,接着又有别的文字见刊。学人都有这种青涩而珍贵的经历。就我而言,守护职业良知,扶掖后进,敬重贤达,已成常规,至今年事衰残,终感释然。

历经二十余载,敬民人到中年,从“青椒”到教授,从外语学院的一院之长到《上海翻译》执行主编,在一条不平坦的道路上辗转往复、发幽探微、跋涉攀登,已为译界周知。至今,他的编、译、著甚丰,现自选已发论文26篇,分类编目,汇集成册。选集内容周全,从翻译总论到分论,从翻译教学到翻译实践,都有所涉,大致代表了他教学和科研的成果。

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学者来说,恐怕没有比选对学术方向更为重要的了。敬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选定以社会学视角研究翻译,课题是前沿的、有远见的,对此国内外至今乐此不疲、研究不辍。他在10年前写道:作为当前西方翻译研究中最重要、最突出的一个发展趋势,在几十年的时期内,翻译的文化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社会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被文化研究遮蔽了,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基本上成为文化翻译研究的附庸或者点缀,失去了它应有的独特研究视角,直至在翻译文化研究热潮渐渐淡去、社会学视

角的翻译研究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见本书“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问题与前瞻”)

新世纪以降,“翻译文化研究的热潮渐渐淡去”,国际上加速构建翻译社会学。2005年5月“作为社会实践的口笔译”的国际会议在奥地利格拉兹大学翻译系(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Graz)举办。会议的主旨是推动翻译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同年末,《The Translator》出专刊讨论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及翻译社会学。2007年,由格拉兹大学翻译系的沃尔夫(Michaela Wolf)和夫卡利(Alexandra Fukari)主编的《建构翻译社会学》(*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一书由本雅明出版公司出版。2009年,贝克(Mona Baker)和萨尔登哈(Gabriela Saldanha)新编的《翻译研究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收入“社会学途径(sociological approaches)”新词条(贝克认为翻译研究中的“turn”无非是研究途径的转变,故用“approaches”)。学者们从社会学的不同侧面提出各种译学模式和构想。福塞斯(Díaz Fouces)运用社会学上的准则、偏差、符号边界以及后结构主义方法,提出跨学科研究模式。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在分析各种翻译学模式和方法的基础上,提出过建立翻译社会学的构想。伊基拉利(Moira Inghilleri)运用布迪厄的社会文化理论,把翻译置于更广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在社会结构、社会建制内,分析翻译的文化、历史、政治特性。(Inghilleri, 2005)沃尔夫认为翻译是一个受社会调整的行为,是一种社会实践,译者既是翻译的建构者,又受到社会建构的制约,因此对翻译的社会含义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虑。他在“翻译社会学及其行动主义转向”一文中回顾了翻译“社会学转向”的背景,并分析其局限性与发展前景。沃尔夫呼吁研究者不要将目光局限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建议从翻译研究的视角研读其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本,思考译者在地区冲突、人权立法等现代情境中的角色与作用,建立考察上述情境下译者政治场域的方法论与理论框架,进而从社会行动

主义的视角分析惯习背后的政治因素。由上述众说可见,国际上翻译的社会学研究已成鹄的。

敬民的博士论文《〈圣经〉汉译的文化资本解读》,即以《圣经》汉译为研究对象,运用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符号权力”“符号生产”“符号商品”“资本”等社会学概念,解读“文化资本”。这些概念也是建构翻译社会学常用的概念。敬民深度拓展“场域”“权力”等概念,提出“翻译场”和“翻译权力”理论,从而使“场域”“权力”理论更有利于分析翻译与社会、政治的关联。

社会学研究的视角相当宽广,它研究社会生活、社会制度、社会行为、社会变迁和发展等各类社会问题。所谓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就是以翻译这样一种在当今人类社会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社会实践和现象为研究对象,以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为基础来对作为社会现象的翻译展开解释性探索。它强调的是翻译的社会性,注重翻译与社会其他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见本书“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问题与前瞻”)从社会学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角度,“翻译不是由译者一个人单独完成的,而是诸多行动者(包括人和物)相互连接,构成一个行动者网络,动员网络中各行动者来完成翻译任务。各个行动者在网络中的作用同等重要。……行动者网络就是行动和所有的因素联结,构成一个网络,只是这个网络既包括人的因素,也包括物的因素,因而是异质的网络,而且人和物应该同等对待。”(黄德先,2006)

“译者研究”是敬民早期的另一个研究专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翻译研究的低潮过后,蓄势待发。1997年《上海科技翻译》第1期发表了高宁的《论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兼论翻译标准的设立原则》,从此拉开了我国研究译者主体性的序幕。可以无愧地说,《上海科技翻译》对译者主体性的讨论早于国内同类期刊好几年,国内的讨论要到新世纪以降才逐渐升温。从高宁发文至今20年,译者主体性的讨论仍在继续。可见这一命题的重要性、复杂性和可持续性。

不过,敬民对“译者研究”早有准备。他1995年初发表“试论情感在翻译中的作用与局限”,1997年在高宁之后刊发“论译者的个性问题”,2000年“翻译研究的思维视角”见刊,2002年“翻译理解的工作心理探析”问世,2004年又有“翻译维度的主体问题思考”的文章与读者分享。以上选文均见本文集“译者研究”部分,大多刊登在《上海科技翻译》上。选文之外,因本书篇幅所限,同一主题的其他文章只得雪藏。

敬民二十多年前就着手的译者研究很有见地,令我受益匪浅,拙作《翻译新论与实践》(青岛出版社,1999)有“情感与选材”一小节,主要参考并引用他的《试论情感在翻译中的作用与局限》(1995)。文中有言:“情感除可以决定译者的选材以外,其作用还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译者是否具备强烈的情感在翻译中表现为其能否具备持久的注意力和深入感知翻译材料的兴趣。一般地说,在强烈情感的驱使下,译者的深层心理容易被唤醒,使译材的情感世界同译者内心世界中积累的种种情感相互撞击和融化,从而激发出新的情感并凝聚于译文中。”微言精理,读来感佩于心。之前,研究译者情感和心灵的文献如凤毛麟角。于是我曾希望他把这一课题深入下去,建构自成体系的学术范畴。这段时期,他果然灵感泉涌,著译不辍,“译者研究”部分的6篇选文竟有5篇于千禧年前后完成。但后因课题本身的复杂性及主观事务的干扰,未能如愿。现在只能以“译者研究”部分作一阶段性了结,实成憾事。

国际上,译者研究依然在深入开展,是翻译学的热点和前沿,不过,学理更深,手段更新,新兴科学和高科技手段一并上阵,来寻找译者翻译行为和翻译思维的“黑匣子”。铁木茨科(Tymoczko, 2012)在《翻译的神经科学》一文尝试将神经学与翻译研究相结合,指出:口、笔译过程的神经病学机理是翻译研究的主要未知领域之一。目前,从大脑活动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考察翻译行为是翻译研究领域的一块处女地。而功能核磁共振成像与正电子放射断层造影术等新技术极大地推动了神经科学的发展,使观测正常人大

脑活动成为可能。文章聚焦知觉、记忆与大脑塑性 (brain plasticity) 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探讨神经科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如果人类的翻译行为与知觉活动紧密相关,那么如何在翻译中消除文化偏见,如何有助于译员培训等问题或可得到解释。作者认为,对译者大脑神经活动的微观考察和对翻译行为的宏观研究相结合,将革新对翻译活动的现有认识,促成更大的研究成果。而马丁(Martin, 2010)的《追溯认知翻译学的发展》则从认知翻译学角度考察口笔译行为在人类大脑中的工作机制,认为翻译行为的发生与心理结构或心理过程相关。文章认为,从认知视角讨论口笔译行为应立足于实证研究:验证理论是否与现实相符。作者强调认知翻译学研究来源于认知科学,应与后者的基本原理以及研究成果保持一致。作者关注口译员思维活动的释意派翻译理论,关注认知科学中的信息处理范式。

一路走来,敬民不但研究翻译理论,而且重视翻译实践,至今已汉译小说数部。从翻译实践中悟出理论的真谛,理论的敏思又触发翻译实践的灵感,这本来就是学人英华内敛、情抒意宣之道。他对语言研究,特别是法律语言的研究情有独钟,本文集中的代表作有“法律英语名词化词语的汉译研究”“试论英语抽象名词及其汉译”等篇;敬民一度在上海政法学院执教,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法律英语必了然于胸。于是研究法律英语,编写法律英语翻译教材成为一段时间的当务之急,沿袭下来,自然成为目前的学术兴趣之一。这方面,在文集中还有“英汉法律翻译教学面面观”“法律英语教学若干问题的探讨”“英汉法律翻译教材研究”等代表作。

通读各篇,形散神凝,学术思想游走于多元知识要素之间,汇聚于翻译理论、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的三维空间,请读者明察。

参 考 文 献

- [1] 黄德先. 翻译的网路化存在[J]. 上海翻译, 2006(4).

- [2] Inghilleri, M. The Sociology of Bourdieu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bject”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J]. *The Translator*, 2005(2):125-145.
- [3] Martin, Ricardo Muñoz. Leave No Stone Unturn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Translatology[J].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2010(5), 2:145-162.
- [4] Tymoczko, Maria. The Neuroscience of Translation [J]. *Target*, 2012(24), 1:83-102.
- [5] Wolf, Michaela.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nd Its “Activist Turn”[J].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2012(7), 2:129-143.

方梦之

2017年2月8日

上海梅城寓所

独辟一径探译道,多重视角论译事

——写在傅敬民教授所撰《译学荆棘》付梓之际

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带来的变化可谓沧海桑田,民富国强的现实图景已扑面而来。这其中,翻译所起的作用巨大,因为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都是以翻译为前导的,离开了翻译,国外的信息、科技无法进入中国,对外的商业贸易无法进行,各种双向交流更加无从谈起。中国的实践证明,对于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确实是“不翻译就是死路一条”(Translate or die!)。我国几十年丰富的翻译活动也同时促进了我们翻译事业的整体繁荣,翻译事业的繁荣又必然促进我国翻译研究与翻译教育的发展,而这后两者对于我国今后全面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更有着潜在的重要意义,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甚至还可以接着这么说:不研究翻译(包括翻译教育),我国下一个阶段的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进展就会受到影响,起码在各领域高端人才的培养上,在实现中国文化、中国资讯有效走向世界这一点上,会遭遇瓶颈。如此看来,国家近几年从政策层面越来越重视翻译(包括翻译研究与相关人才培养),确是前瞻之举,而我们从事翻译研究与教育的众多同仁身上的责任又因此而更添一重。

傅敬民教授所撰《译学荆棘》的整个主题体现了国家翻译事业的需求与学者学术兴趣的良好统一。全书构建四个模块,简洁而互为钩联,分皆可独立成章,合则为一个有机系统,依据我的理解,全书脉络如次:

首先,由翻译的理论思索引出国内外相关进展的描述,进而提出作者自己在翻译理论建设上的观点与视角,既吸收相关国际新

论,又兼纳国内学人的新鲜见解。

其次,由实践层面介入,回答在纷繁的翻译实践中如何处理涉及译技、译艺的诸多问题。翻译的细节往往可以考验某些理论的成熟度或适用面,敬民教授从大量译例中撷取最具典型的几类句段做分析思考,事在谈“译功”,意却在引“译道”,其背后透露出的启示正是中国翻译学者的正道取向,即翻译研究须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只清谈玄论无助于国家的翻译大业。

再其次,他笔锋顺势转向对译者的研究,先以主体性之说提出宏观看法,再以个性分析讨论译者问题的复杂性,对其中最不能回避的三个因素,即心理状况、能力基础、情感局限逐一进行探究,使得译者研究这一题目避免了某种刚性规范的硬约束,体现出译者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在熙攘的大千世界中的存在状态。其中隐藏的一个结论或是不言而喻:译者之行为应被视为社会存在与个性展现(或张扬或压抑)的结果。

最后一个部分,作者自然回归到翻译的讲坛与课堂,使前面三个部分的内容阐述与分析结论有一个综合的落脚点。大学的翻译学者承担着培育译才的任务,“翻译教师如何为?”必定是一个需要认真思索与回答的问题。敬民教授在书的最后这个部分,并未作宏大繁多的叙事,而是抓住了两个非常关键的要点来讨论。其一是学生外语思维的培养,其二是翻译技术工具的借用。我本人十分赞成对这两者的重视或强调。培养翻译人才,不能仅靠用词、句的转换、技巧的训练来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外语思维能力才是最根本、最核心的。同时,在多媒体融合,IT技术一日千里的今天,借助翻译技术工具,提升翻译速度与质量也是今天译才培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翻译学者研究翻译总会体现或者流露出自己的特色,敬民教授当然也不例外。他的这本论文集很明显地展露出他的学术专攻:一是他对《圣经》的研究与翻译,二是他对社会学的研究与翻译,三是他对法律文件的翻译研究。因为自己在这三个领域有经

年的积累,有经年的体会,许多例子的引用都可以信手拈来,不少联想喻譬的出现就显得自然贴切。由此,也让我意识到,翻译研究要做得出色(至少在中国),除了学者本人要熟稔中西译学的一般理论、掌握翻译的一般原理与策略外,很重要的还应在某个或某几个学术研究或译写领域有自己的田园,且常在那里耕耘不辍。我以为,可以将这样的“私人田园”看作学人的“后方基地”,在需要时,可为前方提供不可或缺的给养。敬民教授有三个大“后方基地”,且看来都储屯充足,这一点特别令人印象深刻,也顿时让我产生思齐之念。大概也正是因为有许多翻译研究者都有着或大或小的自耕地,今天国内外的翻译研究才会呈现丰富多彩的图景,才会被披上一件鲜亮的“跨学科研究”的外衣,我想。

何刚强

2017年2月28日

跋涉在翻译研究的途中

——写在《译学荆棘》出版之前

磕磕绊绊地行走在译学途中，一晃就是二十多年。一个二十几岁的风华正茂青年，也就在不知不觉之间年过半百。少年的时候，仰望那些五十多岁的专家学者，感觉自己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是那么遥远，如今一不留神，也时常被人称为专家或者学者，心中的恍惚与忐忑，只有自己知道。

我与翻译结缘，正是应了那句“世事难料”的老话。专科学校毕业后工作了几年，在乡镇中学教英语，恃才傲物，不甘于浑浑噩噩度日，却又不肯“头悬梁、锥刺股”地苦读，晃晃荡荡终于考上研究生，进入上海外国语大学攻读英美文学专业，还没怎么适应研究生的学习与生活，怀揣着对弥尔顿的一知半解就毕业了。为了留在上海工作，就近在原上海工业大学基础部谋到了一份教大学英语的教职。站在讲台上，心里只是庆幸自己终于成为上海人，对未来依旧茫然无措，没有辉煌过去，也展望不到璀璨的未来，做了很多的梦，但没有一个梦是与翻译有关的。

好在还有一份喜欢读书的爱好，于是在周末的时候，就常常夹着几本书到办公室去消磨时光。周末的办公室大楼，没了工作日的喧嚣，往往很安静。记得那是个星期六的上午，我开着办公室的门正在看一本接受美学方面的书，斜对面的办公室来了一位50岁上下的男教师。一则不善于交际，二则初来乍到，对于周围的老师，我实在不熟悉。所以我也没太在意，继续看我的书。可过了一会，这位老师踱到我的身边，问我看什么书、从哪里毕业分配来的。我都老老实实地回答了。于是他便自我介绍说姓方，又问我怎么

周末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看书,我说宿舍大家在打牌,我与大家不熟悉,没地方去,就躲到办公室里来了。方老师看了我几眼,问我对翻译感不感兴趣,我说读研究生的时候读的是英国文学方向,对翻译不是很了解。“那么有没有兴趣做些与翻译有关的事情呢?”方老师继续问道。我以为要我翻译点什么东西,于是就说可以的。接着方老师就说,他手头在编辑一本翻译类杂志,缺一个助手,问我有没有兴趣一起做做。我懵懵懂懂就答应了。

上班后我就按照方老师的指点去他的编辑部。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编辑部会是那样的简陋!一间小小的阁楼,里面有一张桌子,两把木头椅子,其余的就是一堆堆的杂志。方老师让我坐他对面椅子,然后就给我十来个装有读者来稿的信封,让我打开后一一登记。登记完后,他抽出其中的几份稿件,让我自己看。

老实说,我很多地方都看不懂。无论是大学还是研究生期间,翻译都不是我的所爱。我的档案里现在还记录着我在研究生期间的翻译理论成绩:75分。这个成绩,我后来终于明白,是邱懋如老师法外开恩才有的。否则,我连毕业都难了。好在方老师说没关系,多看看就会懂的。又给我两本翻译研究论文集,让我先看看翻译类中文书,扫扫盲,积累一些知识。

回到宿舍后我又找出研究生时候的翻译教材,Peter Newmark的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就这样,一边看中文的翻译论文集,一边看英文的原版教材,同时继续看方老师交代的作者来稿,几个月后,渐渐地,对翻译越来越感兴趣,有一种别有洞天的感觉。于是跃跃欲试将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中的“Technical Translation”译成汉语给方老师看。方老师看了后,对其中的许多错误做了修改,就在1992年第2期的“他山之石”栏目中登载出来了。这是我的名字第一次铅印发表在正式杂志上,那种感觉无异于看到自己孩子的出生。

1993年,我又在方老师的指导下写了一篇3000字左右的小论文“漫谈译者”,参加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的年度科研论文评比,不

料得到了三等奖。后来又近水楼台先得月,方老师将该文压缩成1000字左右登载在杂志的“青年来稿”栏目中。尽管只是豆腐块文章,却是我第一次将自己的观点予以公开发表,并且由此开启了自己译学荆棘丛中的艰难跋涉。

这一跋涉,就是二十多年!二十多年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很多:结婚生子,挣扎商场,游历宦海,职称晋升……有的记忆犹新,有的如我指间的青烟,翻个卷,消失了,再也无从寻觅。所幸的是,二十多年来发表的文字,靠着网络等技术的进步,完整的保存了下来,供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反思、回忆。“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鲁迅,《呐喊·自序》)对于自己曾经在寂寞中书写的文字,我也是不能忘却,尽管世人或许已经全然忘记了它们的存在。因为这些文章不仅见证了我的寂寞,同时也见证了我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深入发展。

我对翻译的认识,最初是从研究译者的思维、心理开启的。这与我在研究生时期喜欢读一些心理学和哲学方面的书有关,也与毕业后开始喜欢读接受美学理论方面的书不无关系。经由接受美学,我又对心理语言学发生了兴趣。在此二者理论的牵引下,我尝试谈了自己对于翻译思维、译者的个性、翻译中译者情感因素等话题。诚然,由于缺乏对相关理论的系统研究,所谈的深度极为有限,免不了只是局限于自己的体悟以及对前人经验的总结,再加上自己当时缺乏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因此,对于译者的思维以及翻译心理过程的了解总有一种隔靴抓痒的感觉。可能学术的道路就是这样走出来的,从某一感兴趣的视角出发,逐渐地扩大视野。慢慢地,我发觉许多层面的问题已经超越了我的知识范围,而且也觉得无法把握了,我开始感觉需要对自己的知识系统化。正如贝尔(Roger T. Bell, 1991)所言,“如果翻译理论想摆脱个人译事感言式的讨论,想避免为实现‘正确’翻译而随意罗列‘规则’,而着手系统、客观地描写翻译过程,就需要了解并熟悉语言的本质、功能的